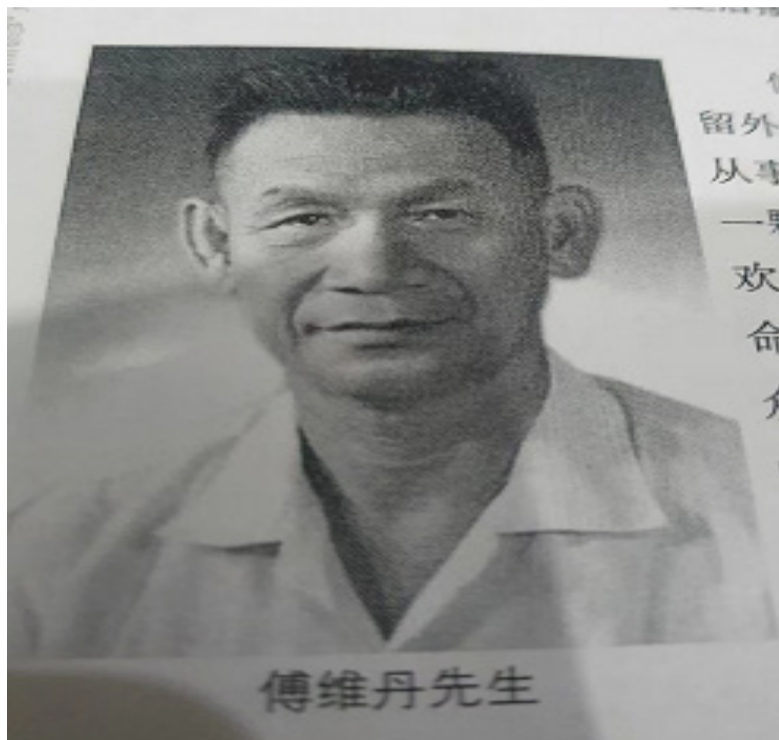


华社精英创办三宝垄新友社 和新友中小学 (二)



傅维丹先生

1948年10月，又有警员奉情报局之命到新友社执委兼国语讲习班讲师郑曼住宅抄家，把郑关进监狱3个月（转换过3次牢房，其中一次关进四壁无窗，只有一个地下通气小孔的黑暗狭窄的密室），释放后数月内还得每天去情报局签名报到，不准离开三宝垄半步，此谓之“城市拘留”。

与郑同时被捕入狱3个月的还有一位新友社社员，其罪名为在市场出售香港寄来的《文艺生活》杂志（司马文森主编），触犯了荷印殖民当局的“禁书令”。1949年4月，情报局又派出一批警员包围和抄查新友社（当时社所已迁至中街[GANG TENGAH]），用卡车带走了大批文件、案卷、书报、教材，甚至连新友义校的小学

生习字簿也不放过，装满一卡车。这次抄查时把国语讲习班负责（教导主任）兼讲师陈利带到局里审讯一昼夜；同时被审讯的还有郑曼、李南、陈泉等新友社骨干。虽没关进监狱，但数月内须每天到局里签到。1949年9月22日，荷印殖民政府教育部（在雅加达）以“宣传共产主义，触犯荷印法律”为理由，下令封闭新友社国语讲习班；两个月后（11月22日）又下令剥夺陈利和另一位国语讲习班讲师的任教职。

1949年12月27日，荷兰正式向印尼移交政权。1950年2月，新友社向印尼政府申请复办国语讲习班，并于同年9月底获准复办，直至1966年为止。

(二) 从新友义

校到新友中小学

新友社成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创办新友义校（全称新友社附设义务学校）。自1947年3月9日新友社社所从北高然街迁至中街后，楼房面积比以前宽大得多，而且这楼房原是战前仁和学校的校舍，该建筑虽略嫌古老，但有许多教室，还有宽敞的阅览室，是个比较理想的办学场所。考虑到战后三宝垄华侨教育事业被中华教育协进会一手独揽，强行贯彻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毒害广大华侨儿童和青少年；考虑到战后华侨积极要求学习中华文化，有不少家长愿意让子女读中国书，而华校日益拥挤，不少学龄儿童面临失学危机；再加上当时三宝垄郊外和爪哇内地

正处于战争状态，迁入三宝垄市内的难侨日益增多，其子女的入学问题也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于是新友社执委会于1947年3月23日决定创办新友义校，同年7月7日开学。

新友义校最初只办小学1-5年级，招收贫侨子女免费入学（并酌赠课本纸笔）。按当时义校的财力状况，决定招生人数以300名为限额。1948年1月4日举行恳亲会和学生成绩展览会，家长

和社会人士对学校的教学效果产生了信任感，学校的社会名愈来愈高，愿意送子女进新友义校的家长越来越多，学生报名人数逐年骤增。

根据家长们的请求，从1949年2月开始增设下午班，并对300名限额以外的学生酌收学费，以缓解教室紧缺和学校财力不足的问题。下午班增设后，新友义校蒸蒸日上，学生人数由300余名增至500名，教职员也由初办时的11人增至13人。1950年上半年，学生人数增至700余名，教职员增至19名。1950年7月，增设初中部和幼儿园。1951年上半年，学生人数达816名，教职员27名。1952年1月13日，新校舍建成（在斯达提安街[SETADION]），全校中小學生迁进新校舍上课，幼儿园学生仍在中街旧校址上课，校名改称为“新友中小学”（简称“新中”）。新校舍建成后，继续扩大招生，学生人数由1953年的900余名增至1954年的1300余名（其中免费生390余名，占30%）。1954年7月，增设高中师范班。1955年初，又增设普通高中部。至1957年底，培养出首届普通高中毕业生27名。1955-1959年，全校学生人数达1500-1700名，教职员约60名。60年代（至1966年为止）学生人数达2000余名，教职员约

70余名。

新友义校创办初期，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讥笑它“不自量力”，预言它“最多只有3个月或半年的寿命”。荷印殖民当局曾经派警员对它突然袭击，又是抄查又是捉人传讯、还剥夺了它的负责人陈利的任教职（前已述），想迫使它办不下去而夭折！然而新友义校不但没有夭折，而且一年年发展扩大，从创办至50年代中后期，它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新友义校和新中教书育人大致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向华侨子女传授新思想新文化，重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大约在1948年，雅加达《生活报》发表了苏联作家盖达尔写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译文），新友义校教师即在学生中广为介绍，全校掀起了“学习铁木儿”的热潮。许多学生或利用下午、晚上的课余时间，义务修理课室的桌椅；或凑钱帮助家境贫困的同学购买学习、生活用品，而不留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善言劝告同学改正错误等等。这种活动一直持续至50年代。1950年以后，义校校务委员会尤其注意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针。